

关系强度、融资渠道与农户借贷福利效应*

——基于信任视角的实证研究

周小刚¹ 陈 熹²

摘要：本文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基于江西省 726 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关系强度、融资渠道与农户借贷福利效应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农户借贷行为的发生更多地依赖于其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关系网络在农户借贷交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在关系强度对组织型正规借贷和关系型民间借贷的影响中均具有显著作用；人际信任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大于对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制度信任对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大于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虽然关系型民间借贷的发生频次大于组织型正规借贷，但由于信贷资金数量和用途上的差异，正规信贷更有利于提高农户借贷福利效应。

关键词：农户借贷 关系强度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福利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长期以来，农户金融抑制一直都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比较普遍的现象。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和提高农户贷款可获得性，自2013年1月1日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农户贷款管理办法》，银行业信贷支农力度和农户贷款的发放规模持续加大，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发挥农村金融的经济杠杆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显示，无论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金融机构，都倾向于向具有良好社会资本的农户提供信贷，社会资本有利于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徐璋勇、杨贺，2014）。当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家庭福利产生负向效应时，民间借贷往往成为替代品，可减轻正规信贷约束对家庭福利的影响（Tran et al., 2016）。当前，建立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目标是为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提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公共服务创新：协同模式、运行机制和政策仿真研究”（编号：71563011）、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农村创业环境评价与优化机制研究-基于金融支持的视角”（编号：16ZT32）、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编号：16ZT29）和江西教育厅一般科技项目（编号：GJJ1505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笔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增加农户收入、减少贫困和实现包容性发展。因此，深入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影响，对于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是经济系统构建和运行的“润滑剂”，有助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近年来，借鉴社会资本理论探讨农户借贷行为、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热点，大量研究集中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和借贷金额的影响方面。例如：社会资本中的政治关系、邻里关系、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等对农户借贷均有显著影响，而亲戚关系的影响不显著（童馨乐等，2011）；农户从民间渠道融资的能力不仅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也会受到财富的影响（梁爽等，2014）；农户家庭社会网络有助于改善家庭信贷约束的困境（申云，2016）。仅有少量文献讨论了农户借贷福利效应。例如：借款对农户纯收入和福利状况有显著影响，增加对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贷款可以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李锐、李宁辉，2004；褚保金等，2009）。

本文从社会网络“关系嵌入性”的角度出发，通过文献回顾，引入关系强度、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等重要概念，利用中国江西72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关系强度、信任形式与农户借贷行为选择及其福利效应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 农户借贷行为中的关系强度。关系强度是社会网络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特征变量，是行为主体之间互动时间、情感强度、关系紧密程度以及互惠服务4个变量的函数（Granovetter, 1973）。社会网络中成员间互动时间长、感情深厚、关系紧密、互惠服务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借贷双方关系越紧密，越能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建立起稳固的信托关系，从而为借款人带来更大的信贷资金量和较低的贷款利率（Kysucky, 2015）。

2. 信任对农户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信任是信用和信誉产生的基础。建立在关系基础和感情联系上的信任属于人际信任；通过因外在的制度和规范建立约束或预防机制来降低社会交往复杂性而形成的信任则属于制度信任（Luhmann, 1979）。现实信用环境中的道德约束等对农户恪守诚信能够发挥有效激励，借贷双方相互信任，就会实现“信任—守信”的纳什均衡（孔荣等，2009）。张三峰等（2013）认为，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更愿意从农村信用社获得正规信贷资金。

3. 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差异。民间信贷资金和正规信贷资金支持都可以减弱信贷配给，促使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入；若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则农户净收入和消费支出就会减少（Li, 2013）。学界普遍认同借贷对农户纯收入和福利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渠道哪一个对农户借贷福利影响更大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一方面，有研究认为，正规信贷资金往往会被用于生产性用途，影响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其福利水平（Barslund and Tarp, 2008）；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民间融资同样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资料投入，对其产出、收入和福利有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影响（李锐、李宁辉，2004）。这种分歧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现有相关文献没有从社会资本角度回应关系强度如何通过信任机制影响农户借贷行为进而影响其借贷福利效应，更缺乏对不同融资渠道影响农户福利效应差异的深入探讨，尚未打开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黑箱”。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实证层面给予证明。

（二）研究假说

本文中“关系型民间借贷”是指农户通过其关系网络达成民间借贷的经济行为，“组织型正规借贷”是指农户与正规金融中介机构之间达成借贷的经济行为。同时借鉴Luhmann（1979）的前述观点，本文将农户借贷中依赖于感情联系、具有亲疏远近关系特征信任称为人际信任；农户借贷中依赖于信用评级等制度与规范的信任称为制度信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 农户借贷行为中关系强度对信任水平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指出，信任的形成是以施信者与受信者之间通过双向交流、情感互动获得的信息量为基础的。关系强度越强，相应的同伴压力和惩罚的影响越大。以关系网络和嵌入资源为基础，长期的交往、紧密的感情联系和频繁的互惠帮助使得更多的个人信息被他人知晓，有助于借贷双方彼此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的形成，进而为农户借贷行为的发生奠定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a：关系强度对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人际信任形成具有正向影响。

H1b：关系强度对农户借贷过程中的制度信任形成具有正向影响。

2. 农户借贷行为中人际信任对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的影响。关系型民间借贷是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之上，由对等了解和情感信任所维系着的乡土关系有助于改善农户借贷资金的可得性并降低贷款成本。正如杨汝岱等（2011）所指出的，农户借贷用途已经不是能否获得民间贷款的主要原因，贷方会更多地考虑亲缘关系，社会网络成为农户平衡现金流、弱化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手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人际信任对农户关系型民间借贷渠道的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

在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中，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资金用途多元化和借贷风险复杂化问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需要依靠长期形成的信任来规避风险，减少农户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对正规借贷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农户违约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b：人际信任对农户组织型正规借贷渠道的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

关系型民间借贷所依托的依然主要是社会网络，以“圈子精神”为核心形成的持续人际信任机制是农村民间借贷的重要基础。正规借贷双方的人际信任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彼此的合作，但是，正规借贷往往需要抵押或担保。相比较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农户之间的借贷是基于彼此的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c：人际信任对农户关系型民间借贷可得性的作用大于对组织型正规借贷可得性的作用。

3. 农户借贷行为中的制度信任对组织型正规借贷和关系型民间借贷的影响。在正规借贷行为中，除了抵押担保、利率水平、还款时间和还款能力等因素外，作为制度信任的信用评级是农户能否获得正规贷款的决定因素。2013年起实施的《农户贷款管理办法》明确指出，金融机构贷前调查应当借助村委会等社会力量，深入了解借款户的人品、信用和经营情况等软信息。这意味着农户信用评

级和信誉度评价直接影响其正规借贷的可得性。同时，由于声誉、口碑的外溢效应，农户的信用评级、信誉度评价也会影响其获得民间借贷资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a：制度信任对农户组织型正规借贷渠道的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

H3b：制度信任对农户关系型民间借贷渠道的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

以农户信用评级形式存在的制度信任，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建立在一定的契约关系基础之上。农村金融制度、规则、法律和惯例的不断完善，进一步规范和约束着金融交易者的行为，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相互信赖、共同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关系型社会资本在农村正规借贷中的作用不断弱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c：制度信任对农户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大于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

4.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渠道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影响。经济学中“福利”的概念是指在收入获得和心理满足这两个方面给个人或群体带来的种种好处。农户通过民间借贷或者正规借贷渠道获取生产性资金和生活性资金，生产性资金常被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缓解投资约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生活性资金一方面能缓解农户的消费约束，使其获得消费效用，提升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为保障生产性资金的投入提供了条件。在现实中，虽然确实存在少数农户借贷后因为经营不善而境况下降的案例，但是，整体而言，更多的农户通过借贷获得资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从而改善了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a：关系型民间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具有正向影响。

H4b：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具有正向影响。

5.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渠道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贡献的差异。正规借贷渠道和民间借贷渠道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贡献的差异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本文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从资金用途、农户分化和投资比例三个方面开展分析。第一，资金用途方面。按照麦金农的“借贷资金—技术投资—收入水平”模型（罗纳德·I·麦金农，1988），在两周期雪研究框架下，农户借贷资金按用途分为生产性借贷资金和生活性借贷资金；理性农户将生产性借贷资金作为要素投入，通过优化生产决策和技术投资，影响下期收入和消费支出，在更高水平上缓解消费约束，实现家庭总效用最大化。遵循麦金农的金融发展理论逻辑，生产性借贷资金有利于优化农户跨期投资和改善消费约束，生活性借贷资金则主要满足农户当期消费需求。因此，一般来说，等量信贷资金若用于生产性用途，则可能对农户改善家庭福利的边际效用更大。

第二，农户分化方面。农户分化会导致借贷对农户福利改善效果的差异，这反映在借贷资金的可得性和资金使用效率两个方面。家庭资产少、富裕程度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往往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或所获贷款额较小，且由于缺乏投资理财经验，其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低；而家庭资产较多、较为富裕的农户则可能获得较多的正规贷款，且由于更注重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其资金使用效率也相对较高。正如陈雨露、杨栋（2007）所指出的，富裕农户可以定性为“理性小农”，普通农户可以定性为“生存小农”；正规信贷在“理性小农”层面有效率，而在“生存小农”层面无效率。

第三，投资比例方面。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二元供给渠道在农村地区长期并存，但其资金在用途上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民间信贷资金，正规信贷资金更多地被农户用于生产和投资。这一点也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例如Khandker，2003）。

因此，本文认为，农户分化为“理性小农”和“生存小农”，关系型民间借贷资金常被用于满足“生存小农”的当期生活性需求，组织型正规借贷资金常被用于满足“理性小农”的生产性用途，而等量资金被用于生产性用途可能对农户改善家庭福利的边际效用更大，更有利于实现消费和投资的跨期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5：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影响大于关系型民间借贷。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框架

根据前面的文献回顾和理论研究，本文提出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及借贷福利效应作用机理的研究框架（见图1），即：借贷主体之间关系强度会影响彼此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建立，频繁的社会互动、互惠服务和邻里监督形成特殊的关系集合，有利于缓解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农户选择将借贷资金用于生产性用途或生活性用途，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最终提高家庭福利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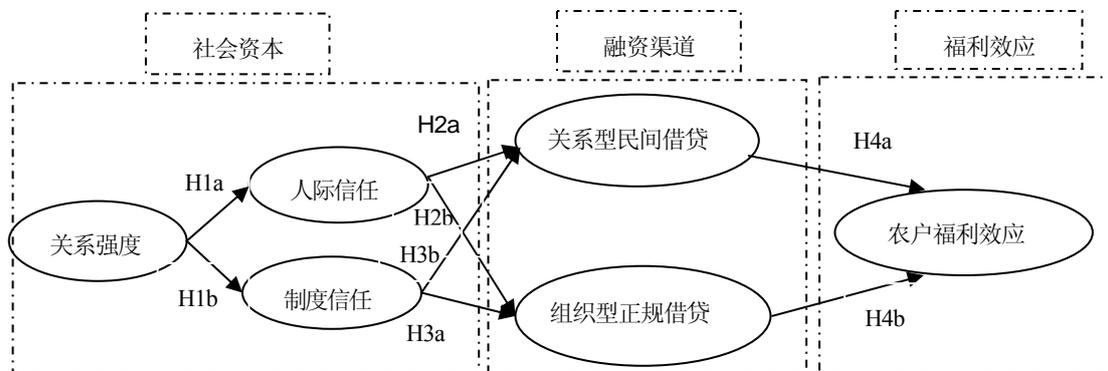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研究方法

现有文献讨论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 Logistic 等计量经济模型（童馨乐等，2011），但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户借贷行为的成果非常少见。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够处理不能直接测量的潜变量，而且能够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干扰，这正是本文研究关系强度、人际信任、制度信任、融资渠道和福利效应等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此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模型时没有直接使用借贷资金数量和家庭纯收入作为变量，而是使用融资渠道与借贷福利效应潜变量；此外，结构方程模型本身是建立、

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的方法，能以较小的误差测度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三）研究数据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西省小额贷款担保中心和华东交通大学“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借贷行为”课题组于2014年1月进行的调查。该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借贷情况、社会关系、家庭收入和消费情况4个部分。正式调查之前，课题组先在江西省丰城市小港镇发放了120份问卷进行小规模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修改了问卷。正式抽样的原则如下：首先，抽取江西省南昌市、上饶市、鹰潭市、抚州市、吉安市、宜春市、九江市作为代表性地级市；其次，在各地级市各抽取1个县（区、市），在每个县（区、市）抽取1个乡镇，随机抽取约150个农户为调查样本。实地调查的9个县（区、市）如下：上饶婺源县，鹰潭贵溪市，抚州东乡，吉安永丰县，宜春丰城市、靖安县，九江永修县，南昌湾里区和南昌县。调查采用会议座谈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400份，剔除调查信息不完整和作答不真实的问卷，结合受访者年龄分布情况，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26份。

（四）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 样本农户的个体、家庭和经济特征。根据表1，在726个样本农户中，受访者中年人居多，平均年龄为39.3岁，年龄在31~40岁和41~50岁的样本占比分别为32.2%和45.3%；受访者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41.3%，受访者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占比合计为23.7%；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数量集中在4~6人，占72.2%；2013年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万~5万元之间，占43.0%。

表1 样本农户的个体、家庭和经济特征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性	572	78.8
	女性	154	21.2
年龄	31岁以下	95	13.1
	31~40岁	234	32.2
	41~50岁	329	45.3
	50岁以上	68	9.4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37	5.1
	小学	161	22.2
	初中程度	300	41.3
	高中、职高、中专、技校	172	23.7
	大专、本科及以上	56	7.7
家庭人口	3人以下	158	21.8
	4~6人	524	72.2
	7人以上	44	6.0
家庭年收入	1万元以下	49	6.7

1万~5万元	312	43.1
5万~10万元	242	33.3
10万元以上	123	16.9

2. 样本农户借贷行为特征。根据表 2，在生产性用途中，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扩大农业生产的发生频次最多，为 29.5%；在生活性用途中，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的发生频数最多，为 20.2%，其次为购买、建造和装修住房。从近三年借款频次来看，来自邻里、熟人、朋友圈的借款占 34.9%，来自三代以内亲戚圈的借款占 29.2%，来自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占 31.8%。在借贷资金数量方面，考虑跨期因素，近三年农户向亲戚朋友、地下钱庄借款的平均额为 29804 元，向银行机构和政府小额担保后再向银行借款的平均额为 52761 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正规借款发生频次不如非正规借款高，但是，农户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的信贷资金平均额大幅度高于从非正规渠道获得的信贷资金平均额。

表 2 农户借贷行为特征

	具体用途	频数	百分比 (%)	
借贷资金用途	生产性用途	买农具、化肥，扩大农业生产	384	29.5
		生意投资	230	17.6
		买卖股票	2	0.2
	生活性用途	看病就医	93	7.1
		红白喜事	36	2.8
		购买、建造和装修住房	220	16.9
		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	264	20.2
		其他	75	5.7
近三年借钱对象	邻里、熟人、朋友圈	403	34.9	
	三代以内的亲戚圈	337	29.2	
	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	368	31.8	
	向小额信贷中心担保后再向其他机构借款	32	2.8	
	地下钱庄	16	1.4	
近三年借款数额	向亲戚、朋友、地下钱庄借款平均额	29804 元		
	向银行机构借款平均额	52761 元		

注：借贷资金用途和借钱对象为多选项题目，此处百分比以频数合计为分母计算。

（五）变量测量与检验

1. 变量测量。本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对关系强度等潜变量的各个维度进行测量，回答选项分为 5 个级别，如“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 1、2、3、4、5。

（1）关系强度。本文参照 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关系强度的 4 个维度，用认识时间、感情

深浅、联系频率和互惠帮助 4 个指标进行测量。

(2)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本文在参照 Luhmann (1979)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区分的基础上, 结合 Lewis and Weigert (1985) 的研究, 将人际信任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用信任认知程度和感情和睦程度 2 个指标来测量人际信任; 结合张三峰等 (2013) 的研究, 用农户的信誉度水平、诚信评价程度 2 个指标来测量制度信任。

(3) 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本文依据金烨等 (2009) 关于非正规借贷和正规借贷渠道的分析, 并结合农户信誉、参加专业合作社、农户联保小组等情况, 分别选取 3 个指标对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 2 个变量进行测量。

(4) 农户借贷福利效应。本文参照褚保金等 (2009) 关于农户借贷福利变量的设定, 从家庭收入、生产规模、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 4 个方面进行测量。

以上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3。

表 3 农户借贷行为调查问卷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潜变量	编号	测量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关系强度	a1	与借贷人之间认识时间	3.57	1.23
	a2	与借贷人之间感情深浅	4.20	0.86
	a3	与借贷人之间联系频率	4.42	0.90
	a4	与借贷人之间互惠帮助	4.03	0.88
人际信任	b1	信任认知程度	4.30	0.68
	b2	感情和睦程度	4.22	0.71
制度信任	b3	信誉度水平	4.14	0.70
	b4	诚信评价程度	4.30	0.86
关系型民间借贷	c1	容易从亲戚处获得借贷	3.98	0.86
	c2	容易从邻居处获得借贷	3.95	0.91
	c3	个人信誉影响民间借贷	3.81	1.00
组织型正规借贷	d1	与银行机构建立经常性联系有助于借贷	3.50	1.04
	d2	参加专业合作社有助于向金融机构借贷	3.92	0.92
	d3	参加农户联保小组有助于向金融机构借贷	3.54	1.01
借贷福利效应	f1	借贷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	4.06	0.81
	f2	借贷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	4.03	0.90
	f3	借贷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	3.77	0.89
	f4	借贷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3.95	0.83

2. 问卷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本文信度检验采用克隆巴哈 α 系数和折半信度系数作为检验标准, 用来观察问卷各项的内部一致性。当克隆巴哈 α 系数值大于或等于 0.70、在 0.35~0.70 之间和小于 0.35 时, 所对应的信度水平分别为高信度、一般信度和低信度; 折半信度系数的标准一般为

大于 0.5。经计算, 问卷中每个潜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整体来看, 所有潜变量的折半信度系数均在 0.5 以上, 部分潜变量的克隆巴哈 α 系数值略低于 0.7, 且所有潜变量都在一般信度以上的水平。这说明, 关系强度、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组织型正规借贷、关系型民间借贷和农户借贷福利效应潜变量所对应的题项具有良好而稳定的信度, 因此, 本文研究所用量表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

表 4 潜变量的信度检验

潜变量	克隆巴哈 α 系数	折半信度系数
关系强度	0.72	0.67
人际信任	0.60	0.60
制度信任	0.56	0.56
关系型民间借贷	0.56	0.53
组织型正规借贷	0.72	0.77
借贷福利效应	0.86	0.82

效度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本文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结合了社会资本理论, 咨询了相关专家, 经过预调查并修正了问卷提法, 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表明, KMO 检验值为 0.90, Bartlett 球度检验近似卡方值结果为 4865.60,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本文所用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这说明, 本文数据的效度比较高。

因此, 可以认为, 本文所用量表的各构面的测量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数据质量和可靠性比较高, 从而为下文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四、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 结构方程模型原理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方法分析关系强度、人际信任、制度信任、融资渠道和农户借贷福利效应之间关系的作用机理。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

1. 测量方程。测量方程反映测量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通常写成如下形式:

$$X = \Lambda_X \xi + \delta \quad (1)$$

$$Y = \Lambda_Y \eta + \varepsilon \quad (2)$$

(1) 式和 (2) 式中: X 表示由外生潜变量 ξ 的可测量变量组成的向量; Y 表示由内生潜变量 η 的可测量变量组成的向量; ξ 表示由外生潜变量组成的向量; η 表示由内生潜变量组成的向量; Λ_X 表示测量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Λ_Y 表示内生指标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2. 结构方程。结构方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通常写成如下形式:

$$\eta = B_{\eta} + \Gamma \xi + \zeta \quad (3)$$

(3) 式中： B 表示内生潜变量系数阵； Γ 表示外生潜变量系数阵； ζ 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二)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

本文依据上述原理，利用 AMOS20.0 软件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 (ML) 进行了估计，选取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度指数的拟合指标对模型拟合度进行评价，并结合修正指标值进行修正。模型整体适配度卡方值为 577.27，卡方自由度比 (CMIN/DF) = 4.69 > 4 ($p=0.000 < 0.01$)，拒绝虚无假设；RMSEA=0.07，GFI=0.92。由于卡方自由度比容易受到样本量大小的影响，当样本量较大时，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小于 5，模型估计结果是可接受的 (侯杰泰等，2004)。一般认为，当 $N > 500$ 时，样本量就比较大。考虑到本文样本量较大 ($N=726$)，结合其他适配度指标值 (例如 RMSEA 和 AGFI 等)，则可以接受此模型估计结果。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模型的拟合指标值

统计检验量	拟合指标	评价标准	模型结果	拟合情况
绝对适配度指数	GFI	>0.9	0.92	理想
	AGFI	>0.9	0.89	略低
	RMSEA	<0.08	0.07	理想
	CMIN/DF	<5	4.69	理想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0.9	0.88	略低
	IFI	>0.9	0.91	理想
	CFI	>0.9	0.91	理想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0.5	0.66	理想
	PNFI	>0.5	0.71	理想
	PCFI	>0.5	0.73	理想

关系强度、人际信任、制度信任、融资渠道和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关系路径和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图中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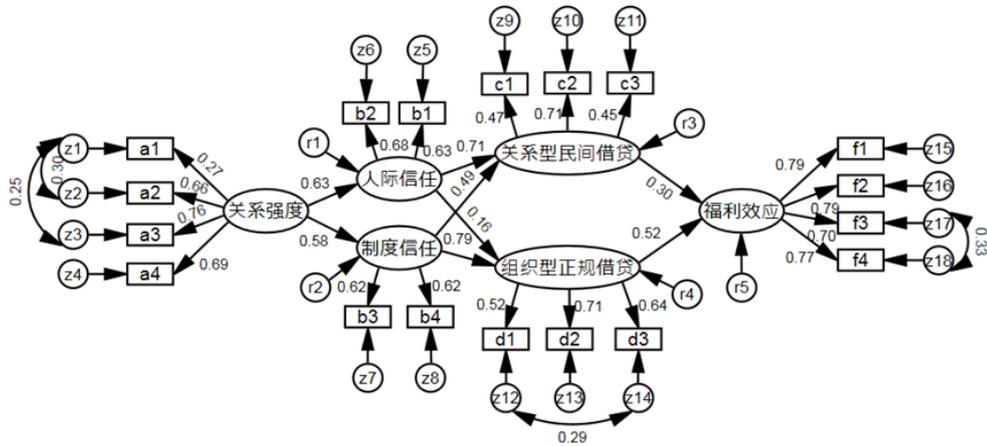


图2 关系强度、信任、融资渠道和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 假说检验结果及分析

1. 农户借贷行为中关系强度对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有显著影响。从图2和表6可以看出，在农户借贷行为中，关系强度对人际信任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0.63 ($p=0.000 < 0.01$)；关系强度对制度信任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0.58 ($p=0.000 < 0.01$)。信任来源于紧密、对等的人际关系，长期互动能使更多的个人信息被他人知晓，交互过程中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得以形成。因此，紧密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改善模糊状态下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加深双方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程度。研究假说H1a和H1b得到了支持。

2. 人际信任对农户的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均有显著影响，且人际信任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大于对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人际信任对农户的关系型民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0.71 ($p=0.000 < 0.01$)；人际信任对农户的组织型正规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0.16 ($p=0.000 < 0.01$)。人际信任是农村非正规民间融资的重要纽带，同时，人际信任也会弱化正规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农户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发生。此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说H2a和研究假说H2b。

进一步比较人际信任对农户的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人际信任在关系型民间借贷中的路径系数(0.71)大于在组织型正规借贷中的路径系数(0.16)。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农户在农村“差序格局”形成的信任半径内，依据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波纹式扩张的人际关系展开行动。以“圈子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弱化了信息不对称，使得大多数情况下农户之间的借贷关系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由“感情投资”维系的乡土关系为农户获取金融资本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民间借贷关系大多基于彼此的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不需要抵押和担保，因而人际信任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大于对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此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说H2c。

3. 制度信任对农户的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均有显著影响，且制度信任对组织型正

规借贷的作用大于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制度信任对农户的组织型正规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0.79 ($p=0.000<0.01$)；制度信任对农户的关系型民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0.49 ($p=0.000<0.01$)。因此，由农户信誉度水平和诚信评价程度所代表的制度信任，不仅对其获取正规借贷有着特殊意义，而且高等级的信用评级会产生外溢效应，也有利于农户获得民间借贷资金。此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说H3a和研究假说H3b。

进一步比较制度信任对农户的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制度信任在组织型正规借贷中的路径系数(0.79)大于在关系型民间借贷中的路径系数(0.49)。这说明，制度信任对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大于对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当前，以信用评级为代表的制度信任更有利于农户获取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与非正规借贷中的人际信任不同，当农户凭借高等级的信用评级申请贷款时，金融机构放款往往是基于对信用评级制度的信任。从本质上说，农户获取正规信贷体现了金融机构对信用评级、农户联保等相关制度的认可与鼓励，这种制度信任有助于农村信用“软约束”环境的形成。随着关系型社会资本在正规借贷中的作用逐渐弱化，以制度信任形式存在的组织型社会资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说H3c。

4.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显著作用于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关系型民间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 0.30 ($p=0.000<0.01$)；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了 0.52 ($p=0.000<0.01$)。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均为农户提供了生产性资金和生活性资金，有利于提高农户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户收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意味着，需要规范和引导民间信贷市场，发挥和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互补、协同作用。本文研究假说 H4a 和 H4b 得到了支持。

5.组织型正规借贷大于关系型民间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贡献。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52，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路径系数为 0.30，二者均在 0.0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影响的路径系数比较大，本文研究假说 H5 得到了支持，即：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作用大于关系型民间借贷。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资金常被用来满足“生存小农”的生活性需求，如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和婚丧嫁娶的当期资金需求；而组织型正规借贷的资金常被用于满足“理性小农”的生产性用途，并且等量的生产性信贷资金对于农户改善家庭福利的边际作用更大。第二，通过正规借贷获得的资金一般都有“续贷”机制，比如政府担保小额贷款政策、农村信用社随借随还余额控制方法，在 1~2 年的还贷周期结束后，农户可以再次续贷，用以扩大生产，缓解跨期生产和消费约束；而民间借贷资金往往受到较强的还贷时间约束，缺乏灵活的“续贷”机制。本文研究调查显示，虽然农户正规借贷的发生频次不如民间借贷多，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贷资金的平均数量却高于民间借贷。这一现象揭示的积极意义是，自“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贷”“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和《农户贷款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正规信贷服务在促进农户贷款规模稳步增长和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表 6

假说检验结果

作用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差	临界比	p 值	假说	检验结果
关系强度→人际信任	0.63	0.05	10.40	0.000	H _{1a}	支持
关系强度→制度信任	0.58	0.04	9.42	0.000	H _{1b}	支持
人际信任→关系型民间借贷	0.71	0.08	7.948	0.000	H _{2a}	支持
人际信任→组织型正规借贷	0.16	0.08	2.68	0.007	H _{2b}	支持
制度信任→组织型正规借贷	0.79	0.13	9.23	0.000	H _{3a}	支持
制度信任→关系型民间借贷	0.49	0.07	6.70	0.000	H _{3b}	支持
关系型民间借贷→农户借贷福利效应	0.30	0.11	4.14	0.000	H _{4a}	支持
组织型正规借贷→农户借贷福利效应	0.52	0.07	6.66	0.000	H _{4b}	支持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都得到了支持, 其内在含义在于: 特定村域内农户基于长期交往、感情联系和互惠帮助形成的关系网络, 有助于持续增加借贷双方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程度, 有利于农户获得正规和非正规借贷机会, 进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依据江西省 726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尝试性地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中关系强度、信任、融资渠道和借贷福利效应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在农户借贷行为中, 关系强度直接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程度; 人际信任对农户获取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均发挥着显著作用, 并且人际信任对农户获得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大于对农户获得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 制度信任对农户获得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均发挥着显著作用, 并且制度信任对农户获得组织型正规借贷的作用大于对农户获得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作用; 关系型民间借贷和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均有显著作用, 组织型正规借贷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作用大于关系型民间借贷。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 不断加强借贷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合作, 充分利用基于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 积极发展农村民间和正规金融市场。第二, 推进诚信农户、信用村、信用镇等组织型社会资本建设, 推动农户信任从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变, 充分发挥信用在农村金融市场运行中资金配置、风险控制的功能。第三, 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放大农业信贷担保的杠杆倍数, 引导、鼓励和促进农户依托金融资本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实现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 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 2009: 《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 6 期。
2. 陈雨露、杨栋, 2007: 《国家农贷有效率吗》, 《财贸经济》第 6 期。
3. 金烨、李宏彬, 2009: 《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借贷行为》, 《金融研究》第 4 期。

- 4.孔荣、Calum G Turvey、霍学喜, 2009:《信任、内疚与农户借贷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甘肃、河南、陕西三省的问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 5.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2004:《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6.梁爽、张海洋、平新乔、郝朝艳, 2014:《财富、社会资本与农户的融资能力》,《金融研究》第4期。
- 7.李锐、李宁辉, 2004:《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分析》,《经济研究》第12期。
- 8.罗纳德·I·麦金农, 1988:《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9.申云, 2016:《社会资本、二元金融与农户借贷行为》,《经济评论》第1期。
- 10.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 2011:《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 1003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金融研究》第12期。
- 11.王性玉、胡亚敏、王开阳, 2016:《自我信贷配给家庭非正规借贷的增收效应——基于河南农户的分位数回归分析》,《经济管理》第4期。
- 12.徐璋勇、杨贺, 2014:《农户信贷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 11 省(区) 1664 户农户的调查》,《中国软科学》第3期。
- 13.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 2011:《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 14.张三峰、王非、贾愚, 2013:《信用评级对农户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影响——基于 10 省(区) 农户信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 15.Barslund, M., and F. Tarp, 2008,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in Four Provinces of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44): 485-503.
- 16.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17.Lewis, J., and A. Weigert, 1985,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 *Social Forces*, 4(63): 967-985.
- 18.Khandker, R. S., 2003,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Evide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Banglades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2): 263-286.
- 19.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 Li, Rui, Qinghai Li, Shao'an Huang, and Xi Zhu, 2013, "The Credit Rationing of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Welfare Los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China Economic Review*, 9(26): 17-27.
- 21.Kysucky, Vlado, 2015, "The Benefits of Relationship Lending in a Cross-country Context: A Meta-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9(29): 90 -110.
22. Tran Minh Chau , Christopher E. C. Gan, and Baiding Hu, 2016,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ir Impact on Farm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Vietnam's North Central Coast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43(8): 782-803.

(作者单位: ¹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²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董 翀)